

个税修订“揭幕”分配改革

美国热衷亚太经济意图何在

核心提示

4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全国人大财经委认为,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关于“逐步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机制”的要求,此次修改只是完善个人所得税的第一步。

免征额的选择

这也是自2006年提高免征额以来的第三次上调。财政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相比其他两次,此次将工薪所得扣除费用一下子提高了1000元,幅度已经比较大。”至于为什么是3000元,而不是5000元,或是比3000元更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10年度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包括基本生活支出和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支出)为1123元/月,按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1.93人计算,城镇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消费性支出为2167元/月。2011年按城镇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消费性支出增长10%测算,约为2384元/月。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草案拟将扣除费用标准由现行的2000元/月提高到3000元/月。

财税部门因此认为,实际上,提高到3000元已经预留了未来一段时间

均消费性支出增长的空间。即使按每年10%增长,到2013年也没有达到3000元。

同时,确定这一标准还有三方面的考虑:一是个人所得税的纳税面不能太窄。按照目前标准调整后,工薪所得纳税人占全部工薪收入人群的比重,由目前的28%下降到12%左右。发达国家多为50%到80%。如果提高到4000元,纳税面降为4%,如果为5000元,纳税面又降为3%;二是不宜对政府的公共财政收入影响太大,过大将削弱政府对低收入者的补贴和公共服务能力;三是提高费用扣除标准不能一劳永逸,而是依据居民基本生活支出费用的变化适时调整。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如玉也指出,工薪所得扣除费用标准上调,优点和缺点并存。优点表现为其直接降低了纳税人的税负,纳税人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自己税负的减轻。纳税人不仅可以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的,而且可以从中看到政府改革的信心,感受到政府解决民生问题、应对通货膨胀的决心和毅力。

负面作用则体现为随着免征额的提高,纳税人会不断减少,这会令居民纳税意识的提升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免征额的提高会对居民收入调节产生一定的“累退”作用,是对缩小贫富差距的反向调节。因为仅仅提高免征额,最大的受益群体是低收入群体。

发挥“削高补低”作用

郝如玉认为,要消除免征额提高后的“累退性”,真正发挥个税“削高补低”

的作用,免征额的提高应该与级距和税率的改革同步进行。这也是此次修法的一个重要方向。

草案拟将现行工薪所得9级超额累进税率修改为7级,取消了15%和40%两档税率,扩大了5%和10%两个低档税率的适用范围。同时,草案还扩大了最高税率45%的覆盖范围,将现行适用40%税率的应纳税所得额,并入了45%税率,加大了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

谢旭人表示,“实行提高工薪所得扣除费用标准与调整工薪所得税率结构联动,其目的除简化和完善税制外,主要是使绝大多数工薪所得纳税人,能享受因提高扣除费用标准和调整税率结构带来的双重减税优惠,使高收入者适当增加一些税负。”以5000元为例,调整前,应纳税额为325元,调整后应纳税额为125元,降低了200元。

此次调整后,纳税人税负的变化,有关部门作了测算。月收入15500元(含“三险一金”,下同)以下的纳税人,可以享受提高扣除费用标准和调整税率结构带来的双重减税。这一部分纳税人占工薪所得纳税人数的90%以上。

个税调整的未来空间

对于私营企业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征管,税务部门坦陈了其中的难点:一是很多私营企业会计核算不规范,存在大量现金交易,收入隐蔽性强;二是一些私营企业不分配利润,个人投资者不从企业领工资,而将个人及其家庭成员财产和消费支出列入企业生产经营支出,甚至以发票报销、假票冲抵费用等方式逃避纳税义务;三是一些私营企业投资者举办多个公司,在所属公司之间进行股权、资产关联交易,逃避纳税义务。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当前个税改革朝着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方向迈进仍面临很大难度,要推进综合计税,需要实现纳税人信息申报的网络化,个人全部收入信息实现网络全覆盖,纳税人社保制度也要健全,同时稽查能力要跟上。

未来的改革方向还包括基本费用扣除在现行工薪所得扣除费用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单项扣除项目;重新设计综合所得税率;构建新的征管机制等。还应加快税源结构调整,推进从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演变,同时还应当加大高收入人群的税收监管,规范灰色收入地带监管。

据新华社



(资料图片)

美国近期积极推动亚太新经贸战略,这从委派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以及国务卿希拉里在APEC高官会议上的阐述,可窥一斑。

在美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开始眼睛向外,以寻求经济复兴之道。亚太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美国前十大贸易合作伙伴中,有6个来自亚太地区。希拉里在APEC会议上明确表示,美要以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为亚太自由贸易协定模板,并把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作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重点。

作为第一个跨越太平洋东西岸,覆盖亚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多成员自由贸易安排,TPP最初由四个中小经济体组成(又被称作P4)。但是,随着美国决定加入TPP,TPP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型FTA,成为一个号称“高质量的21世纪”自由贸易协议,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

美国之所以全力推进TPP,其背后既反映了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的全球经济贸易格局的深层次变化,也凸显了美国主动进行的经济结构和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首先,全球经济重心正从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地区偏转。全球经济与贸易重心正在发生转移。进入新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冲击着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力量架构,特别是近年来,亚太地区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有包括APEC21国、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25国、东盟10国、太平洋岛国论坛16国等众多经济和贸易同盟,其人口总数、GDP总量均占世界第一。其中,仅APEC成员国人口数量即达27亿,占全球40%,GDP和贸易量总额分别占全球的53%和54%。后危机时代,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更加明显。根据2009年的实际经济增长,在世界平均增长率为-1.1%的情况下,亚洲新兴国家(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等)达6.2%,亚洲经济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OECD预测,2010年OECD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2.8%,相比之下,2010年亚洲经济(不包括日本)的平均增速可以达到8.2%至9.4%,相当于OECD国家的三倍,亚太地区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亚洲新兴经济体潜在需求巨大,内需潜力渐趋形成,对欧美经济依赖度下降,对内需求依存度

开始上升,更是在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扮演着向全球输出总需求的重要角色。这是美国全力推动TPP的最深层次的原因。

其次,美国希望通过“重返亚洲”完成其全球布局的总体战略。在这种格局演变下,不仅中国和日本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的跨太平洋贸易也已超过跨大西洋贸易。仅2007年,美国同太平洋彼岸的商品贸易额就达到了1万亿美元,1/4的美国贸易来自东亚地区,而美国似乎又置身于亚洲贸易同盟伙伴之外。2009年,东亚第15次峰会首次明确将以“10+3”机制作为实现东亚共同体长期目标的主要载体。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启动,令美国倍感压力。此外,日、韩、印、新等与东盟的FTA谈判也基本完成。“10+3”区域内贸易已占全球外贸的58%,高于北美自贸区近3个百分点。美国却完全置身于上述进程之外,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对此,美国既焦虑又担心,所以试图以TPP为突破口,建立以其为主导的横跨太平洋的亚太经济合作体系,并由此建立美国主导的“亚太自贸区”(FTAAP),进而赢得全球的战略优势。

再有,金融危机让美国认识到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性,奥巴马政府将出口促进战略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并提出了在五年内使出口翻番的口号。根据奥巴马的出口战略蓝图,美国政府日前已成立了“出口促进内阁”和“总统出口委员会”,按其目标测算,美国出口将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长,5年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出口额将超过3万亿美元,同时提供2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货物出口额达到2.1万亿美元,回归世界第一的位置,而亚太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成为美国最大和最具潜力的出口市场和投资区域。美国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亚太自贸区可能使美国公司的年出口至少损失250亿美元,或者约20万个高薪岗位。为扭转这种状况,美国急于通过TPP,充分发挥其技术和金融优势,打开更多的亚太国家市场,以提升出口总量,助力美国由“消费驱动”向“出口驱动”转变。

最后一点,这是最直接也是最隐晦的——“平衡中国战略”。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强大与快速崛起,冲击着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力量架构,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9年的8.5%左右。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并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第一引擎。在这种力量升降的大背景下,美国的霸权心态因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而变得愈发不自信,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事实领导作用,令美国感到不安。2010年1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向美国贸易代表处提交了一份关于“支持TPP”的提议,强烈建议美国积极参与TPP谈判。这背后是希望以此全面架空、取代“10+3”,“10+6”,甚至是APEC和拟议中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进而主导亚太经济合作的未来,塑造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新秩序,制衡中国的全面崛起。

据新华社



(资料图片)

新闻时评

信用缺失是中国市场经济的致命伤

越来越不让人放心的餐桌,让普通百姓切实感受到中国企业诚信缺失的严峻现实。据商务部统计,我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违约、造假、欺诈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经济参考报》5月4日)

另有数据显示,我国企业坏账率高达1%至2%,且呈逐年增长势头,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坏账率通常只有0.25%至0.5%;我国每年签订约40亿份合同,履约率只有50%;我国企业对未来付款表现缺乏信心,近33.3%的企业预计情况将“永不改善”。

6000亿元是中国2010年税收总收入的近1/12,可见中国企业的信用缺失已经到了何种地步!这些损失还仅仅是中国企业的,并未将普通公众所受损失及中国社会因社会成员失信所造成的损失计算在内。其实,信用缺失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远远不是损失一些金钱那么简单,它还直接关系到社会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高低,制约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及经济秩序的稳定,是市场经济的致命伤。

市场经济是自由、平等、竞争的经济形式,公平竞争、自由交易是它得以发展壮大前提和重要保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离不开法律规范的引导和约束,但它的良好运转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协商一致和相信能实现各自预期基础上的自觉履行。这就要求市场主体切实树立诚信意识,以“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良好信用示人。如果市场交易各方缺乏信用,彼此担心订立的合同或契约可能沦为“一纸空文”,不仅自己的交易预期泡汤,甚至还可能让自己付出的货物或货款无法追回,那必然会使交易效率大大降低,还会大大增加交易成本,严重的纠纷还会引发危害社会的暴力和凶杀犯罪。

其实,国人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诚信,“人无信不立”、“一诺千金”都是中国社会无比珍视信用的良好佐证。然而,在正式进入市场经济之时,我们的诚信意识和信用观念却大大落后了,原来通行于“熟人社会”的信用规则再也无法保持它的强大活力,不少人“言出必行”的传统理念逐渐被“生人社会”的“赚钱第一”法则腐蚀和掩盖。于是,只要能得到钱,手段是否正当,是否符合道德和法律,是否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已不再重要。加之,我国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对规律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立法约束严重滞后,失信成本过低,最终导致整个社会诚信意识的严重缺失,社会信用变得异常脆弱,几乎处处陷阱,人人自危。

遏止整个社会的严重道德滑坡,拯救社会诚信,已经刻不容缓。当然,这既要靠教育和引导,也要靠规范与制裁。首先要教育公众充分认识到诚信对一个社会的极端重要性,人人珍视个人信用,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要成为信守诺言的模范,给普通公众树立榜样。同时,加大征信系统的建设力度,甚至出现守信留下“污点”,避免守信与不守信一个样,甚至出现守信吃亏的不良现象。另外,还要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制定信用法,为社会诚信提供明确的行为规范和严厉的制裁措施,真正做到“让不守信者寸步难行”。

杨帆

领导超配

新闻:网友爆料称,四川省巴中市所辖通江县、南江县、巴州区、平昌县四区县“超配县长”。四区县均系国家级农业贫困县,经济总量数额不大,但是却有44位正副县长。无论是按5名还是7名职数配备,当地县政府领导均超配50%以上。(5月4日《南方日报》)

领导超配不是因为官员需要而设置,而是根据要做多少事而设置,以事定权,不是以人定权。1个正县长,10个副县长,是不是非要安排这么多领导职位才能做事?不是说减员增效吗?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这个样子?越改越成了胖子?

领导超配据说原因复杂。干部编制有规定,当然不是想加就加,按照各地官方回应,所谓超配主要是挂职、交流、转业安置等多种原因导致,当地领导干部管理有没有问题是一个方面,挂职、交流这种在各地都

少见的现象也不可忽视,这与总体制度环境有关。贫困地区有这样的现象,灼人眼睛,这与贫困地区会因此增加负担有关。贫困地区有这样的现象,灼人眼睛,这与贫困地区会因此增加负担有关。

澳门前体育局局长萧威利涉嫌滥用职权安排一桑拿女技师潘玉萍到体育局下属的运动医学中心工作,被澳门中级法院判处1年徒刑,获缓刑2年。(5月4日人民网)

他得意地对女子说:“小乖乖,你年轻又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让你当乡里的一把手,当县妇联主席。”无独有偶,湖北省荆门市原市委书记焦俊贤,其情妇陈丽原是“三陪女”。焦书记指令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为陈丽伪造了假档案:正式党员、正科级干部、大学本科学历……不久将其提拔为该市开发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无论赵增军还是焦俊贤,都能够说到做到,这让人不得不佩服。相比之下,澳门前体育局局长萧威利确实够“冤”的。首先,他和女按摩师是否

乱聘按摩女被判刑的警示

暧昧尚未可知;其次,他所谓的滥权,其实只是安排潘“以包工形式”于体育局辖下中心内执行运动创伤治疗;最后,他被追究刑责,被判刑1年,获缓刑2年。而起增军们并未受到惩处,其最后落马是因为他受贿等贪腐事件。

所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们更需追问的是,为何萧威利仅仅安排一个合同工就被判刑,而起增军们把“三陪女”培养为官员,却迟迟不被发现?要知道安排合同工,尚容易瞒人耳目,把“三陪女”培养成堂堂副局长,可是要经过一系列程序,哪个环节出问题都不能成功。

说白了,“三陪女”能轻易登上主席台,与一些官员的权力过大有关。在一些地方,“一把手”在人事任免权上,确实具有一言九鼎的作用,甚至是“想管多少管多少,想管多深管多深”。其实,我们并不缺少规范选人制度,既有《干部选拔任用条例》,还有《公务员法》,但这些法律法规现在一些私欲膨胀的“一把手”面前,失去了约束力。

一言以蔽之,网友为澳门前体育局局长“叫屈”,令人百味杂陈,它提醒监管部门,约束权力是多么重要,加强监督是多么必要,严刑峻法又是多么迫在眉睫。

路川

涨电价就能解决电荒?

3月以来,我国多地出现淡季“电荒”现象。浙江、湖南、江西、重庆、贵州等地,均不同程度地呈现用电紧张态势,各地相继采取限电和让电措施。对此,北京师范大学能源与战略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林卫斌接受采访时表示,电煤供需矛盾是造成此轮“电荒”的根本原因,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是上调电价。(中新网4月28日)

在目前听取“涨”声一片的话语氛围中,对于专家建议的上调电价,还是警惕一点为好。造成“电荒”的症结在哪里?短期内和表面上看是煤电供需矛盾造成,实质上是有限的电力增长与粗放发展方式对资源、能源无限索取的矛盾,是电力资源配置不均和用电分布不同造成。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在电力行业的一次显现。

比如,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化工、建材、钢铁冶炼和有色金属冶炼四大高耗能行业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三成以上。这比如有,目前西部地区有极为丰富的电力资源,特别是耗量少、污染少的风电资源、太阳能资源,但是由于西部工业发展落后,导致本地工业用不上这部分电力资源。于是乎,发电的地方电力多,用不上,用电的地方电力少,不够用,地区性矛盾比较突出。据《兰州晨报》报道,目前甘肃酒泉风电装机容量达到516万千瓦,预计到2020年,酒泉风电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以上,占全省电力装机总量的三分之二。对于这部分电力,急需国家从资源利用的角度布局经济发展,实现工业产业与电力资源的对接。

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复燃造成用电量增加,仅靠上调电价就能解决问题吗?当然上调电价,可能会改变一部企业的用电量,但绝不可能使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得以转变,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而且,电是居民的基本生活必需品,涨价必然会对民生造成影响,增加民众的负担。

另外,要让价格发挥调节作用,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市场开放度较高,让价格能够有用武之地。在目前电力行业和企业成为垄断行业的情况下,单方面追求市场价格,让用户承担涨价结果,最终只能导致普通用户负担越来越重,垄断行业利益越来越大。

据《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68.1%调查者认为,专家学者在大多数人心中的权威性下降,因为其被利益集团绑架。电价要求上涨的呼声,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电荒给电力利益集团涨价提供了借口,一些专家的涨价言论,也在为电价上涨推波助澜。

宁宁